

精准扶贫对西南民族关系的影响研究

——以贵州L县为例

李 平

(贵州民族大学法学院, 贵阳 550025)

摘要: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把扶贫攻坚抓紧抓准抓到位,坚持精准扶贫,倒排工期,算好明细账,决不让一个少数民族、一个地区掉队。少数民族作为精准扶贫的关键主体之一,在其主动或被动脱贫过程中,民族关系是否会发生一些变化,又发生了哪些变化?通过田野调查的方法,分析精准扶贫在民族地区的典型案例,探究精准扶贫为西南民族关系带来的影响。研究发现,精准扶贫给西南民族关系的主流影响是好的,但由于歧视心理短期内难以消除、民族文化的流失及精英俘获的冲击等给民族关系带来了潜在影响。

关键词:精准扶贫;民族关系;主流影响;潜在影响

中图分类号:F323.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1883(2018)04-0039-07

Research on Influence to Ethnic Relations in Southwest China Brought by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LI Ping

(Law School, Guizhou Minzu University, Guiyang 550025, China)

Abstract: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 has stressed on many occasions that we must grasp the key tasks of poverty alleviation in a timely and accurate manner, adhere to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reverse the schedule of work, properly calculate the detailed accounts, and never allow any ethnic minority or region to fall behind. As one of the key subjects of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will there be any changes in ethnic relations during the active or passive poverty alleviation process of ethnic minorities? What changes have taken place? By means of field investigation, typical cases of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in ethnic areas are analyzed to explore the impact of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on ethnic relations in Southwest China. The study found that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had a good mainstream impact on ethnic relations in Southwest China, but it was difficult to eliminate discrimination psychology in the short term, the loss of ethnic culture and the impact of elite capture and other potential influence to ethnic relations.

Keywords: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ethnic relations; mainstream influence; the potential influence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把扶贫攻坚抓紧抓准抓到位,坚持精准扶贫,倒排工期,算好明细账,决不让一个少数民族、一个地区掉队。在其主动或被动脱贫过程中,民族关系是否会发生一些变化,又发生了哪些变化?不同主体在实施精准扶贫的过程中,应当注意到那些问题,以避免加重民族关系的潜在风险,发挥好主流影响、传递好正能量,使得精准扶贫能够真正落地生根,得到广大人民群众尤其是少数民族同胞的真心拥护。

李维汉^[1](1982)认为,我国历史上的民族关系是對抗性的社会里的民族关系,历史上各民族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的联系,不是和谐地开展,而是往往伴随着民族冲突和民族压迫,或者就是通过民族冲突和民族压迫来实现的。故不同的朝代在制定少数民族政策方面有意或无意避免这种对抗,力求稳定对民族地区的统治。高旗^[2](1998)认为,汉朝对西南民族地区“羁縻”政策,在保留各少数民族内部的政治、经济、社会结构不变的前提下,维护了

收稿日期:2018-10-09

基金项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服务国家特殊需求博士人才培养项目:西南民族地区社会管理西南民族地区社会管理人才培养项目(学位[2013]4号文)。

作者简介:李平(1983—),男,山东梁山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民族地区社会管理法制建设。

封建王朝形式上的统一,实际上是封建中央民族政策的具体体现。谷跃娟^[3](2008)认为,魏晋南北朝时期蜀汉政权与大姓、夷帅的利益平衡和夷汉关系缓和是主基调,两晋时期,内地王朝错误的民族政策又破坏了蜀汉所构建的政治平衡,南北朝中原地区的政治分裂,致使内地政治势力在西南地区极度萎缩甚至消失,不再成为主导。胡振^[4](2017)认为,宋代民族关系呈现出一种积极向上的发展趋势,偶有反复;民族政策呈现由紧到松、愈发重视的变化过程。宋王朝实行羁縻政策的大背景下,西南边疆得到了持续开发,各民族的生活方式与风俗习惯也有了较大程度的接近。韦应学^[5](1998)认为,明代中央政府在西南地区实行大规模军屯,提高了西南地区社会生产力水平,导致了改土归流的出现,巩固和加强了明王朝对西南地区的统治。蒋立松^[6](2005)认为,汉代至清朝总体而言,西南的华夏边缘地位一直没有改变,不过随着历史的进程也逐渐显现出了从边缘向中心过渡的特点和趋向,尤其是近代以来列强的侵略,特别是全面抗战后西南作为大后方,一度从中国的边缘地位跳跃式地成为了中国的中心。

综上所述,历代中央王朝从把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非我族类”以夷制夷的羁縻政策,到土官土司制度的转变,再到改土归流,不断加强中央集权,对西南地区施加影响,发展到新中国“民族区域自治”等国家政策,也是西南民族关系与中央政权之间、民族关系之间不断统一、整合的历史过程。

贵州省L县位于黔中腹地,总面积1 521平方公里。2014年底,全县共有贫困村74个,贫困乡(镇)6个,建档立卡贫困户9 870户34 027人,占全县总人口的15.02%,以农村总人口19.2 888万人计算,贫困发生率为17.64%,其中一般贫困户6 322户24 857人,占贫困人口73.05%;低保贫困户3 241户8 755人,占贫困人口25.73%;五保贫困户307户415人,占贫困人口1.22%。从总体情况来看,贫困村相对较多,贫困程度较深,贫困人口分布广,贫困人口结构、致贫原因较为复杂,是典型的滇桂黔石漠化集中连片地区贫困县。

2012年,全县总人口为224 266人。少数民族91 754人,占全县总人口的41%,其中,苗族人口4.7万余人,布依族人口4.2万余人,其他少数民族2 000余人。人口在万人以上的汉族、布依族、苗族外,还有彝族、侗族、土家族、壮族、水族、瑶族、毛南族、回族、仡佬族、仡佬族、满族、白族、黎族、蒙古族、藏族、傣族等共28个民族。苗族分布在全县6个乡镇,聚居141个村寨,与汉族杂居161个村寨,与布

依族杂居17个村寨,与布依族、汉族杂居77个村寨。布依族分布在全县14个乡镇,聚居133个村寨,与汉族杂居112个村寨,与苗族杂居17个村寨,与苗、汉族杂居77个村寨。

L县以乡镇为单位共划分了六个战区,由县级领导担任指挥长,全面指导各自战区的工作;乡镇书记为常务副指挥长,负责战区的日常具体工作。2015年以来,在相继下派188名小康驻村干部和“第一书记”的基础上,从县级各部门按照不低于在编干部总数二分之一的比例增派892名干部“全脱产”下沉到村组一线,与1 871名镇村组干部组成2 763人的一线突击队,覆盖所有行政村。同时,按照“分管职责与工作对口,部门职能与工作对口”的原则,由县政府分管副县长任组长、相关部门负责人任副组长,成立6个工作专班,对应资金保障、基础设施、产业发展、就业帮扶、易地扶贫搬迁和政策落实等6个方面工作,列出工作清单,明确工作时限,将责任分解细化到各专班、各战区,具体任务落实到各村突击队、各组攻坚班、各户包保人,全覆盖、全过程纵深开展各项工作。本文以贵州省L县为研究对象,探析精准扶贫对民族关系的新影响。

一、西南民族关系概述

民族关系是指在一定主客观条件下,不同民族之间的交往形式、内容及其历史发展的总和^[7]。

(一)西南民族地区范围界定

西南民族地区就其地理位置而言,处于中国西南部的四川省、云南省、贵州省、重庆市、西藏自治区范围之内,少数民族聚居或与汉民族杂居的地方,这里有着全国民族聚居的主要特点“大杂居、小聚居、交错杂居”。西南是我国少数民族成分最多、人口最多的地区,全国56个民族几乎都有成员在这里繁衍、生息,世居民族有苗、侗、藏、壮、仡佬、哈尼等30多个^[8]。民族种类之多、密度之高在国内当是首屈一指的。

(二)该地区民族关系特点

费孝通先生在研究中华民族形成的历史过程中,提出了著名的“多元一体”理论。从这个理论出发,汉民族与西南少数民族共同创造了当地丰富灿烂的文化,汉民族仍然在这个地区占据主导,是各民族的核心。在这个过程中,汉民族的文化成为与少数民族沟通的媒介,也吸引着西南少数民族不断认同自己为中华民族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一方面西南地区独特的地理环境,山地和高原成为人类发展的巨大障碍,人们的迁移和交往受到

了限制和约束,西南民族地区融入中华民族的进程表现得相对缓慢;另一方面,西南地区丰富的水系,为民族迁移、文化交流提供了天然的便利通道,形成了既封闭又开放的二重特点^[9]。西南民族关系主要有分布上的大杂居与小聚居、政治上的多元一体性、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经济上的互补性、文化上的多元交融性等5个方面的特点^[10]。

当前,我国西南地区以民族区域自治为主,相继推出的“西部大开发”“精准扶贫”等国家政策对该地区影响较为深远。李晓斌指出,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对西南地区民族关系产生的作用有以下几方面影响:积极方面,经济的发展密切了内地与该地区的联系、交流,民族分布格局渐趋合理、民族共同因素增加;消极方面,西南民族地区与汉族地区在经济发展上差距的存在和扩大,影响了民族关系的健康发展,同时存在的问题有西南地区少数民族权益的保障,加上经济体制的转型与传统民族文化的变迁与消失导致的经济、文化问题向民族问题的转化,从而影响民族关系。

二、精准扶贫对西南民族关系的主流影响

(1)精准扶贫强调精准施策、结对帮扶,实现发展的成果由各民族共享,进一步强化了民族沟通,为增强民族团结创造了必要条件。

L县包括少数民族在内的贫困人口,由乡镇、县部门机关干部包保、户户有人管,每月至少走访一次,年初制订产业发展项目,保障农用物资,确保春耕生产的顺利进行;节日慰问贫困户,由机关单位负责资金,甚至帮扶干部自掏腰包;帮扶人全程跟踪贫困户的身体健康状况、子女就读情况,确保贫困户不会出现“小病拖、大病抗”及适龄子女辍学现象发生,干部与贫困户普遍建立了较好的相互信任关系。

贵州的精准扶贫工作,在精准识别的基础上,强调帮扶人与贫困户一对一、一对二、一对三的帮扶,虽然方式较为粗放^[11],但基本上保证了每个贫困户都有自己的帮扶人,由于帮扶人中有汉族也有少数民族,而贫困户中同样既有汉族也有少数民族,使得民族沟通、了解在帮扶工作中从“抽象化”概念领会到“具体化”问题研判、从“灌输化”知识到“个体化”认知、从“纸面化”“碎片化”浅层次往来到“实际化”“整体化”深层次互动。

法律不保护躺在权利上睡觉的人,社会政策对其受惠对象亦是如此。贫困户大多由于其文化素质不高、与基层政府信息不对称等方面的原因,对于普惠性的政策难以触及,形成事实的不公平。而

帮扶人的加入,为贫困户在争取政策支持力度上增添了砝码,各民族也真正能够享受到国家政策的优惠,进一步消除了贫困人口事实上不平等的存在,增强了各民族对党和国家的认同感,民族团结也能够得以顺利实现。

(2)精准扶贫注重对村容村貌等建设的投入,兑现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奋斗目标,为探索村庄治理、民族区域自治的中国模式提供了物质基础。

L县先后投入20亿人民币进行基础设施建设,修通贫困村的入村公路,连接寨寨户户路,打通断头路,有水泥路或公路直通到每户家门口,普遍能够享受到基础设施改善所带来的便利;每户进行改厕、改橱、改圈工程都能得到县政府数量不等的工程补助,D村是以苗族为主的聚居村,在此之前没有一处厕所,项目实施使得每家每户都有了现代化的冲水卫生厕所;在此基础上,村容村貌有了质的变化,以往柴草乱堆乱放的现象大为减少,村民自觉维护村庄的公共环境卫生,并在自家院坝种植葡萄、石榴等可食可观赏的绿色植物,发展“庭院经济”。

在精准扶贫实施过程中,贵州先后出台“四在农家·美丽乡村”基础设施建设六项行动计划、实施改善农村环境“10+N”工程,并涌现出了L县“七改三治两提高”的扶贫典型,各民族受益于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产品如基础设施增加、道路交通便利、村庄环境改善等,增强了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进一步向往。

从政策制定的背景来看,六项行动计划是在溯源于遵义市余庆县、总结遵义14个县市“四在农家”成功经验的基础上而制定出来的,10+N工程则是结合了贵州全力发展“大数据、云计算”的“后发赶超、冲出经济洼地”的省情,“七改三治两提高”是作为2017年退出贫困县之一的贵州L县在扶贫攻坚的决胜阶段自我加压、奋力赶超的结果;从软硬件建设的角度来看,六项行动计划仅关注的是基础设施建设,10+N工程更加注重对民族文化、传统村落的保护,“七改三治两提高”将扶贫提升到村庄治理的高度,贵州在扶贫工作中不断深化认识,探索着民族区域自治的先进经验。

(3)精准扶贫以群众满意度为重要脱贫指标的制度设计,将民族梦蕴含到中国梦之中,有效避免社会对政策的误读,防止新的民族矛盾产生。

以L县D村为例,该村对贫困户实行动态管理,但通过严格的评价程序,不轻易进入与退出。帮扶工作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从开始致力于帮助提高贫困户的经济发展能力,到关注帮扶贫困边缘户、

脱贫返贫户,再侧重于全村所有农户的普遍获得感。以往只走访贫困户的做法被指挥长批评,把贫困户周围的农户也要走访到,了解农户对乡村发展的真实想法及自身困难,正确认识普通农户对政府大力帮扶贫困户的看法。D村帮扶机关干部在对外引进社会帮扶力量时,也格外注意到这一点。D村小学的45名学前班、一、二年级学生获得社会爱心人士物资捐赠时,由于帮扶干部提前介入,没有贫困户与普通农户的区分,更没有汉族学生与苗族学生的分别,都获得了相同款式的过冬衣物、相同型号的学习用具,让学生感到温暖的同时,也获得了学生家长一致拥护。

精准扶贫的脱贫指标,不仅仅测试贫困户对扶贫工作的满意度,而且以非贫困户的满意度为考量标准,这就有效地制止了地方政府盲目尽快脱贫而放任甚至纵容贫困户侵占公共资源,置非贫困户于不顾。但在整个民族村、民族地区,可能会发生为了少数人的利益,人为操控满意度,出现贫困户轮流坐庄、全村落利益均占等政策误读。

以L县为代表的贵州精准扶贫工作,对群众满意度引入第三方结合脱贫前后村寨环境对比进行测评,使更多的人看到,扶贫工作不是只针对某一个民族,而是针对各民族全体贫困人口的帮扶,不分民族,只管贫困,有效地防止了因此而产生新的民族矛盾。

三、精准扶贫对西南民族关系的潜在影响

(一)歧视心理的影响

由于受到封建残余等思想的影响,不同民族间的心理歧视在短期内不会被消除,且在一定范围内随着精准扶贫的深入开展,民族沟通交流不断加强,帮扶人不断对贫困户的民族习惯产生新的认识,有可能将贫困户的致贫原因归结到民族习惯上,如该地区普遍存在的民族早婚制、少数民族节日多而且长,如四月八、六月六、端节,喜欢遛鸟、斗牛、斗鸡等赌博项目影响劳作生产时间。

帮扶人将这些社会现象作为本质进行分析,就有可能从纠正不良的生活习惯发展到反对其民族习惯上来,这对民族关系将带来一定风险。比如,L县张贴的“扶贫不是养懒汉”“争当贫困户,吓跑儿媳妇”甚至是“争当贫困户可耻”的宣传标语,少数民族聚居的边远山寨出现的比率更高,这与广大干部认为少数民族“受教育程度低、内生动力不强”等原因分不开的,调研中L县W镇的有关领导就认为,P村的少数民族群众喜欢饮酒,有的贫困户扶贫

物质刚领到手就被换来打酒喝,有的是一天三醉,即使是贵州省出台公务接待不许饮酒的禁令后,为了搞好该村的工作,镇干部也得利用周末时间与该村村民喝酒,否则工作难以开展。

L县规定帮扶干部走访贫困户每月一次,2017年4月变成了每月两次,到了2017年12月则为每周一次即每月四次,过于频繁的社会互动,使得两者之间的社会距离不断缩小,对帮扶的态度由接受模式渐渐转变为排斥模式,无论是汉族为主的干部还是少数民族为主的贫困户,与个体进行互动的印象有可能会投射到整个群体中去,不可避免产生民族偏见,随着精准扶贫的不断深入,尤其是工作任务不断加码、扶贫指标不断细化,民族歧视在一定范围内会持续存在。

(二)民族文化的流失

精准扶贫“六个一批”的“移民搬迁安置一批”,在实施过程中对民族关系的冲击较大,因为安土重迁是传统中国人的习惯,L县当地民谚“发财离不开老屋基”也表明了祖屋祖产在民众中的重要地位。虽然搬迁地大部分位于城镇区域或其周边,比起故土生活更加便利、经济收入也非常高,但存在不少村民签订了搬迁协议后又反悔的,除了出于对搬迁地不适应的恐慌,当然还存在着与本民族村寨“文化断根”的隐忧。

在进行各项基础设施的建设中,难免地方政府因为功利主义的影响会对古村落、民族建筑造成不同程度的破坏,加上本民族享受现代设施设备带来的生活便利,可能会放弃对传统民族习惯的坚守,盲目发展旅游使得民族习惯商业化而丢掉其原有本质,进一步丧失其传承的意义。同时,村居环境整治中的房屋改造等需要在村民投入一定劳力与资金的基础上,才能获得政府的资金奖补,为了获取相应的政策支持,村民甚至是贫困户不惜举债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村容村貌风风光光、百姓荷包轻飘郎当”,势必加剧不同民族成员的逐利倾向。

P村苗族同胞有着历史悠久的养牛传统,几乎家家养牛,现在即使年轻人外出打工也要把家养之牛寄养于亲戚邻居之家,斗牛是苗族过节保留的娱乐项目。老年人更是有以牛为荣,由于干不动较重的体力活,养上一头大牯牛,既能表明自己还对整个家庭做出经济贡献,不用去住“弃老洞”,在自己过世后,此牛便是上好的祭品,杀掉后可以招待吊唁自己的客人,大大减轻后辈的经济负担。在发展项目过程中,养牛则不是好项目,牛的成长周期长、繁殖率低、见效慢,L县养殖收入的标准是家畜杀掉

或卖掉才能计入,相较之下养鸡、养猪更具有见效快的优势;加上购买仔牛的价格远高于鸡苗、仔猪,有限的项目资金对贫困户不能全部实现覆盖,政府只能选择养鸡与养猪作为脱贫规划,这与包括P村在内的绝大多数苗族聚居村的贫困户热切的养牛愿望不能实现有效契合,而L县另外一个苗族为主的D村,意外获得县领导支持而获得了流动养牛项目,更加剧了其他苗族村寨贫困户的失落感。

民族传统固然有优秀与糟粕之分,但基于扶贫工作任务重、时间紧的压力,政府也只能进行有选择忽视,优秀的民族传统所起到的民族凝聚作用不断减弱,势必会遭到少数民族同胞不同程度的抵抗。虽然从长期来看民族传统不断趋向同一,有利于社会的平衡发展,但西南民族关系的文化多元化、经济互补性等特性也将不断衰弱。

(三)精英俘获的冲击

从制度设计上,精准扶贫仍然没有能够完全杜绝乡村精英对扶贫资源的俘获,乡村干部等内部精英在精准识别、民主评议、政策拟定乃至脱贫评价中都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他们免不了“利己主义”“优亲厚友”的俗套,在贫困户识别上掺杂个人情感因素,在政策拟定上优先考虑自己拿手的项目作为整个村的支柱项目,虽然没有政策支持、帮扶资源的援助,但他们的获利指数可以远远超过贫困户;而一些外来公司、农业投资者外部精英仍然能够打好扶贫这张牌,借用项目扶持、招商引资等优惠政策,利用地方政府急于脱贫做大“经济蛋糕”的迫切心理,自觉或不自觉拿走原本属于贫困户的“奶酪”,引发村民对精准扶贫的反感甚至是对抗,给贫困地区的民族关系带来一定冲击,特别是对民族关系复杂村寨冲击更为激烈。

在精准扶贫基础设施建设、扶贫项目实施过程中,村组干部仍有参与的机会,当然具有承包基建工程的优势地位及项目选择的优先权。P村90%以上的基础设施建设由村组干部亲自承包或者通过其承包给外来的工程队或匠人,这些项目都有扶贫政策的配套资金,做完工程通过政府验收才能得到资金。在工程材料价格全县都统一的前提下,为了赶工以实现利益最大化,承包方尽量抬高工人参与工程施工的工资,P村报账清单工人工资占比普遍为50%~60%,个别甚至达到70%,远高于L县人工费控制在36%以内的要求;D村实施的滚动养牛项目,项目之内的30头牛全部养在养牛场,作为村主任的大户拥有养牛的技术,是养牛场的拥有者。但这30头牛的所有权归全村89户贫困户所有,贫困

户每年投入每头牛的资金为500元,如果不愿投入或者没有资金,则养牛场连续三年每年给贫困户1500元,所有权转给另外的贫困户;如果牛死亡,则贫困户停止分红。在这当中,由于所有的贫困户对远离自家养牛场中的牛没有多少感情,均不愿意出饲料钱,只愿意拿分红的钱,也就是一户可以拿到4500元;三轮之后,所有的贫困户都已轮转完毕,作为养牛场主的村主任给每头牛投入13500元,便获得了牛的所有权,这比市场中购买要便宜得多,且9年的时间,所养之牛繁殖的小牛不属于贫困户所有,这对村主任来说收入不小,无论怎样村主任这类乡村精英又做了一笔稳赚不赔的买卖。

这种与村庄整体复兴脱嵌,缺少村庄参与和监督的产业扶贫,从结构上为腐败预留了缺乏社会约束的制度空间,并且形式主义、权钱合谋、弄虚作假、不负责任等官场作风,通过产业扶贫项目进村,使得丧失公平正义的运行机制转移到农村,污染了村庄的社会文化环境,自上而下,自城市而农村,自官场而社会的“输入”,从根本上是在摧毁原本还算“纯洁”的农村社会^[2]。少数民族村寨对于扶贫项目实施的失望,也有可能对汉族干部、外来公司企业、工程队及匠人的不满,给民族关系的融洽制造一定的阻力;同时,他们也容易看到本地乡村精英、同村同族人员在帮扶贫困户中逐利的一面,也会给本民族内部的和谐带来一定的紧张。

四、小结与讨论

精准扶贫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实施的过程中,遇到与全国其他部分相同的问题,而且夹杂其特殊的历史环境与民族文化,使得该地区又呈现出独有的特殊性,如果政策的实施者不加区分,就很难解决民族关系的潜在风险。本文进行上述考察研究之后,认为需要解决以下3个问题,从而使精准扶贫助推西南民族关系向好的、持续的良性发展。

(一)发挥好当地民族在精准扶贫中的主体作用

不能认为只要支援了西部民族地区建设,建起大项目、拉动经济发展,就实现了边疆与内地的和谐互动,并以“援助者”自居,把民族社会当成一个不变的存在,当地民族有其“自由意志”。用环境、历史来认知事物,会给当局者带来某些“有把握”的感受,是内心稳定的来源,具有普遍的认识意义,社会的某些飞跃变化往往是“例外”造就的^[3]。因此,在精准扶贫工作中,要重视少数民族建设家乡主力军的作用,积极发挥他们的主观能动性,并应当看到民族传统节日调节民族关系“润滑剂”的作用。

少数民族的节日不仅仅是维系他们生产生活的重要纽带。在生产力不发达的年代,高寒民族靠采集蔬菜、水果等植物难以供给他们生存所需要的热量,凭打猎也难以提供稳定的肉制品,屠宰家畜较为方便但易腐烂且保存技术落后,民族节日便发挥了其重要作用,轮流屠宰、全寨村民集中到一家,一天全部食用完毕,既保障了热量的摄入,又没有造成食物的浪费。随着科技的日益进步,上述功能有所减弱,但作为文化的符号应当继续得以保存,也是当地发展旅游吸引外地来客的经济增长点之一。

(二)处理好经济发展与保护好民族传统的关系

要从中国的国情出发,解决好民族间经济利益上的矛盾,减少因经济利益导致的民族摩擦和不满情绪,首先是要花大力气帮助少数民族在保存自身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大力发展经济;其次是在在各级党政领导中克服各种民族偏见的错误认识,才能使西南民族关系向着健康的方向发展^[7]。

精准扶贫的主要目的仍然是发展经济,提高当地少数民族的生活水平,在进行相关基础设施建设中应当吸收民族元素,并要结合其民族习惯配置相应的活动场所,尊重他们的意愿,给予他们选择的自由,对于生活在贫困地区甚至是灾害地区仍不愿意搬迁的民族村寨,允许他们以传统方式生活;对于自愿搬迁的,一方面鼓励他们到搬迁地先行试住,帮助他们务工就业,建立起对搬迁者长期关注的机制,争取搬迁者的信任,帮助进行必要的维权;另一方面又要通过协调解决好随迁儿童就学、随迁老人养老的相关问题,消除他们的后顾之忧,使他们成为少数民族迈入现代化生活的示范者、有力推动者。以此来带动不愿搬迁的本民族成员,减少精准扶贫政策的硬着陆力度,避免民族关系不必要的紧张。

注释:

① 汉武帝时在西南夷设置郡县,以同一族系居住范围和经济区域为行政区划,保留当地民族上层统治者为王、侯、邑长等土官,维护原有的社会统治;同时从内地派流官去任太守、令长,流官管理土官,土官听从流官的调遣,经济上土官把剥削所得的部分以纳贡或赋役的形式上交汉王朝,军事上施行屯守安边,郡县汉城为中心,汉民屯田自民邑为镇压“夷民”的暴力机器,“边郡太守主兵,兵由内地遣戍”。

② 自然区划概念下的西南地区,一般指中国南方地区(不含青藏高原)西部的广大腹地,主要包括四川盆地、秦巴山地、云贵高原等地形单元,大致包括四川省东部、重庆市、陕西省南部、云南省大部、贵州1县、湖北省西部、湖南省西部、广西西北部;行政区划概念下的西南地区,为中国七大地理分区之一(华东地区、华南地区、华中地区、华北地区、西北地区、西南地区、东北地区),指四川、云南、贵州、重庆、西藏5个省级行政区。将广西壮族自治区排除在西南民族地区之外,主要是采用了行政区划的概念。学界对此也存在广义与狭义之分,本文采用的也是狭义的观点。

③ 他认为,中华民族的主流是许多分散孤立存在的民族单位,经过不断的接触、混杂、联结和整合,加上民族自我意识的觉醒不断形成多元整体。在这个统一的整体中,汉民族是当之无愧的核心,作用也是十分巨大的。汉民族大量深入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形成一个点线结合,东密西疏的网络,这个网络成为多元一体格局的骨架。

(三)做好制度预防,避免少数民族成为经济发展牺牲者

虽然国务院出台了《关于开展农村承包土地的经营权和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贷款试点的指导意见》,贵州也积极推动“双置换”印发了《贵州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推进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市场健康发展的实施意见》,并探索出了六盘水的“三变”改革,取得的经验在全国可复制可推广,“三变”“双置换”在政策上得到了国家以及地方政府的支持,但在法律上仍然没有明文规定,所以要谨慎试点,成熟以后再大面积铺开,切忌“一刀切”和“贪大求全”。现今一些地方借土地增减挂钩、“双置换”政策造成农民丧失土地承包权与宅基地,就是一些人借用了发展的名义对农民生存权的侵害^[14]。进行相关改革引入合作公司时,地方政府在合同签订等关键程序,就要提前引入法律顾问、法律援助制度对本地民族利益进行关切,确保公司盈利真正能够以农民分红增收为前提,防止外来精英“做空做走”本地资源。

应当看到的是,驻村工作队、挂帮单位入村工作制度已经使得精准扶贫后续工作产生的民族关系凝聚效果。从目前来看,驻村工作队能够与村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挂帮单位也在频繁的走访中了解村情,精准扶贫后续新增所识别的贫困户,几乎完全屏蔽了村寨内部精英推荐的“关系户”,在产业发展上,摆脱内部精英的干扰,探索出适合本地发展的产业项目,使当地民众真正能够长期受益。由于驻村工作队、挂帮单位工作人员本身素质较高,通过组织年轻干部以夜校、辅导班等形式加强了对贫困户子女的课外教育,贫困户子女的好学上进也在无形之中激发了贫困户自身发展的动力,带来了贫困地区全方位的改变。

④ 2013年年底,贵州省政府出台《关于实施贵州L县“四在农家·美丽乡村”基础设施建设六项行动计划的意见》。意见指出,贵州与全国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重点在农村,关键在农民。通过实施小康路、小康水、小康房、小康电、小康讯、小康寨六项行动计划,力争用5到8年时间,切实改善我省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建成生活宜居、环境优美、设施完善的美丽乡村。

⑤ “十三五”期间,贵州省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工作将开展“10+N”重点建设工程,到2020年实现居住能保障、道路全通达、饮水能安全、户户有电表、村村通宽带、户户通电话、防灾有保障的基本目标,完成全省所有行政村及贫困村寨基础保障建设和环境治理任务,努力建成一批具有贵州特色的美丽乡村。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十大工程:1.垃圾治理工程,采取多元方式治理农村生活垃圾。2.污水处理工程。采取多样性处理方式,实现农村生活污水收集处理,环保达标排放。3.绿化工程。采取自然恢复与人工促进的植被恢复技术,对植被的组成和结构进行优化改造。4.道路工程。加速推进乡村公路建设,形成结构合理、功能完善、畅通美化、安全便捷的农村道路路网。5.供水工程。建立安全有效、保障有力的农村供水体系,推进城乡供水一体化。6.信息化工程。实施“快递下乡”工程,推进农村电商实现“线上线下”交易。7.供电及光明工程。加快农村电网升级改造步伐,提升农村供电能力、实现城乡供电质量、公共服务均等化。8.气化工程。大力推广使用天然气等清洁能源。9.农房改造建筑风貌提升工程。加大村庄特色风貌培育力度,农房改造要体现地域特征、民族特色、山水田园和山地民居特色。10.传统村落保护发展工程。每年重点建设100个传统村落,构建省市县三级传统村落名录保护发展体系。改善农村人居环境N项工程:1.学前教育工程。每个行政村有一所设施基本完善、规模合理的农村幼儿园。2.敬老院工程。推进农村敬老院建设,初步实现全省老年人人人享有基本养老保障。3.卫生计生室工程。原则上每个行政村至少设置1所村计生卫生室。4.村级文化活动室工程。每个行政村至少设置1所村级文化活动室。5.农村商业服务中心。每个行政村建设完成一个设施齐全兼具超市、农贸市场等服务功能的商业服务设施。6.农村社区服务站工程。推进农村社区服务站建设。7.体育活动及健身场地工程。基本完善行政村体育活动及健身设施覆盖。8.活动小广场工程。每个行政村至少建设一个活动广场。9.公共厕所工程。完成全省所有行政村公共卫生厕所建设。10.灾害防治与生态治理设施。完成所有行政村农村消防设施建设和管理。11.电子交易平台。推动农业升级、农村发展、农民增收。

⑥ 贵州L县以优化人居环境、增强扶贫斗志、强化内生动力为目标,将美丽公路创建和“改造危旧房(改厕、改厨、改圈、改房)”、改路、改水、改电、“治理柴草乱堆乱放”“治理垃圾乱扔”“治理污水乱排”等村庄整治有机结合,并与美丽乡村、民居民宿、人文自然景观融为一体,提高村民“精神文化生活水平、管理水平”,强化扶贫根基。“七改”,即“改路、改厕、改厨、改圈、改房、改水、改电”。“三治”,治理柴草乱堆乱放、治理垃圾乱扔、治理污水乱排。“两提升”,提升村民精神文化生活水平、提升村民自我管理水。

⑦ 是贵州、湘西、桂北等地的苗、布依、侗、瑶、壮、彝、土家、仡佬等少数民族的传统节日,各地节日内容不尽相同主要与农事有关。九寨侗族人民管四月八为牛王节,这一天各家的妇女都在家里为牛煮白米饭,炒油茶,条件好的还要煮鸡蛋供牛食用,以示在春耕大忙之前,人们对它的深情慰问和热情奖赏;同样是布依族、仡佬纪念耕牛的节日,与农事有着密切的关系。在罗甸等地叫“牛王节”,镇宁扁担山一带称“牧童节”,安龙、兴义地区叫“开秧节”;也是苗族的祭祖节、英雄节、联欢节。

⑧ 每年农历的六月初六,布依族人民居住的村寨,家家户户都要宰牛宰猪,杀鸡包粽子祭祀祖宗。尔后,合家欢饮。隆重地欢庆布依族人民世代沿袭下来的传统节日。

⑨ 水族端节是以水书水历推算出来的,从头至尾长达49天,是世界上延时最长的节日,又叫“瓜节”,水语称“借瓜”或“借端”。相当于汉族的春节。水族端节,水语称为“借端”。“端”,意为“岁首”或“新年”;“借”,意为“吃”。因此,端节亦可直译为“吃年”,意为“过年”。又因水族的这个年节的日期以水历为准,水历把九月作岁首,岁首要过年,端节就定在九月初九,通称“水年”。

⑩ 精准扶贫实施“六个一批”,根据贫困人口不同致贫原因和发展需求,将其归入扶持生产和就业发展一批、移民搬迁安置一批、低保政策兜底一批、医疗救助扶持一批、灾后重建帮扶一批、教育资助解困一批。

⑪ 弃老洞也叫“寄死窑”、“自死窑”、“老人洞”等,湖北郧县等地大量弃老洞的存在在当地广为流传的弃老传说,对中华民族的敬老传统提出质疑和挑战。在笔者的调研中发现,L县历史上也存在此类洞穴。

⑫ 如今牛肉的价格一般是在35元到45元一斤左右,一头成年牛的体重是在1000斤左右,其宰杀好后其牛肉应该在500斤左右,这样算下来一头牛能卖到17500元。

⑬ “三变”即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资源变资产,主要是把农村的闲置资源利用起来,让企业得到发展的资产,农民得到分红、政府能够得到税收。

参考文献:

- [1] 李维汉.统一战线问题与民族问题[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中国民族关系史论文集(上集)》[M].北京:民族出版社,1982:119.
- [2] 高旗.从《汉书》看汉朝与西南民族关系及其政策[J].云南学术探索,1998(5):65-67.
- [3] 谷跃娟.魏晋南北朝时期西南地区民族关系的变化[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25(1):115-118.
- [4] 胡振.宋代五溪蛮地区民族关系、政策与西南边疆开发——以《溪蛮丛笑》为中心[J].曲靖师范学院学报,2017,36(2):74-79.
- [5] 韦应学.明代西南地区的军屯与各民族间的关系[J].贵州文史丛刊,1998(1):28-29.

建立和完善小岗村法律援助中心,遴选和配备优秀任驻村律师为小岗村改革提供精准化法律服务。此外应该建立和完善小岗村乡村德治治理体系,依托小岗红色文化资源加强小岗人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积极开展有影响力 and 吸引力的小岗德育实践活动。

五、结语

乡村振兴战略是应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主要矛盾转变,促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必经之路,是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战略布局、践行五大发展理念、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必然要求,

为新时代农村发展指明了新的方向和思路,提供了新的机遇。小岗村应该积极抓住乡村振兴战略带来的重大机遇,以习近平总书记“三农”思想为指导,尊重和发挥小岗村群众主体地位,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努力成为新时代乡村振兴的率先践行者。应该深化小岗村农业供给侧改革,完善小岗村现代农业经济体系,推动小岗村农业现代化,殷实小岗村乡村振兴基础。努力挖掘小岗村红色文化的精神价值,以小岗精神引领小岗实现乡村振兴。强化基层组织建设,建立自治、法治和德治相结合的小岗乡村治理体系,助力小岗村实现全面振兴。

参考文献:

- [1] 赵伟峰,刘菊,王才.小岗精神的科学蕴涵及当代价值研究[J].毛泽东思想研究,2017,34(6):38-42.
- [2] 戚嵩,邱乘光.沈浩精神的科学内涵及其对党建的启示[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13(17):29-30.
- [3] 刘涛.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浅议[J].江苏农村经济,2010(12).
- [4] 冯海发.构建现代农业“三个体系”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J].农业经济与管理,2017(5):9-12.
- [5] 储著源.“小岗精神”体现伟大民族精神[N].安徽日报,2018-03-27(006).
- [6] 丁慧民,张任远.红色基地对当地文化及爱国主义情怀传承影响——以安徽省小岗村为例[J].红色文化资源研究,2017(2):96-104.

(上接第38页)

- [32] 许红缨,刘俊,李明.婚姻家庭关系的经济学思考[J].江西社会科学,2003(12):166-168.
- [33] 范飞.家庭馈赠对医疗保险需求的影响——一个非正式风险分担机制的视角[D].上海:复旦大学,2008.
- [34] 于光君.费孝通的“差序格局”理论及其发展[J].社会科学论坛:学术研究卷,2006(12):51-54.
- [35] 夏琪.风俗治理视角下六盘山区婚姻致贫问题研究[D].长沙:中南民族大学,2015.
- [36] 马史火.凉山彝族祖先崇拜与厚葬习俗对社会发展的消极影响及对策[J].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S3):131-134.
- [37] 罗素.幸福之路[M].吴默朗,金剑,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
- [38] 郭云南,王春飞.本土宗教、宗族网络与公共财政[J].经济学(季刊),2017(2).
- [39] 罗章,赵声旭.家支在当前凉山彝族乡村治理中的功能研究——基于社会资本理论的分析视角[J].云南社会科学,2009(3):73-78.
- [40] 张维迎.思想市场推动中国变革[J].领导文萃,2014(15):29-32.

(上接第45页)

- [6] 蒋立松.略论西南民族关系的三重结构[J].贵州民族研究,2005(3):178-184.
- [7] 王文光,龙晓燕.中国西南民族关系研究散论[J].思想战线,2001(2):34-37.
- [8] 陈金全.西南少数民族习惯法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2.
- [9] 王文光,翟国强.西南民族的历史发展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关系事与述论[J].思想战线,2005(2):29-35.
- [10] 王文光,龙晓燕.中国西南民族关系研究散论之二[J].思想战线,2002(2):63-70.
- [11] 李平.精准扶贫“单位挂帮”现实困境与路径思考——以贵州L县L县Z局为例[J].贵州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3):197-208.
- [12] 孙兆霞.脱嵌的产为扶贫——以贵州为例[J].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3):14-21.
- [13] 李劫.从西南民族社会看财富、资源与性别分层的关系[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1):57-64.
- [14] 邓瑾.消灭村庄?——中国新城市化之忧[N].南方周末,2010-10-14(17).